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3.004

民国时期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出版概况

刘善涛¹,王梓赫²

1.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2.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基础教学部,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民国时期是我国现代汉语词典的初创时期,为新中国的词典编纂和词典学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民国时期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出版阶段共分为转型初创、缓慢发展和曲折前行三个阶段,所出版的词典共分为综合语文词典、普通语文词典、专用语文词典、专项语文词典四大类型。民国时期“词典”概念的出现和编纂是古今汉语词汇转型中的集中反映,推动了现代文化建设和语言建设,在与社会、读者进行有效互动的同时,也促进了词典功能、体例和类型的成熟。

关键词:民国时期;汉语词典;阶段特征;类型特征;总体特征

中图分类号:H1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3-0024-09

民国时期,新旧文化正值交替之际,辞书承担了整理传统和吸收新知的职责,在我国辞书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被称作我国汉语语文词典现代新兴时期^[1-2],这一时期词典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截至目前,学界对民国辞书史和民国时期现代新型词典编纂状况的专题研究相对薄弱。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工具书索引(如《中国工具书大辞典(正续编)》《民国时期总书目(语言文字分册)》《八千种中文辞书类编提要》等)、网络数据库(如“读

秀学术搜索”“民国文献全文数据库”“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旧书网站(如“孔夫子旧书网”“中华古玩网”)等不同渠道对民国时期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信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采集、甄别与整理,最终建成“民国时期现代汉语词典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本数据库共搜集词典73部,分为语文百科兼收的综合词典、以语文性词语为主的普通词典、专门描述词语某一侧面专项词典和专门描述“某类语言现象和语言活动”的专用词典四种类型^{[3]110},不同年份和类型的词典出版情况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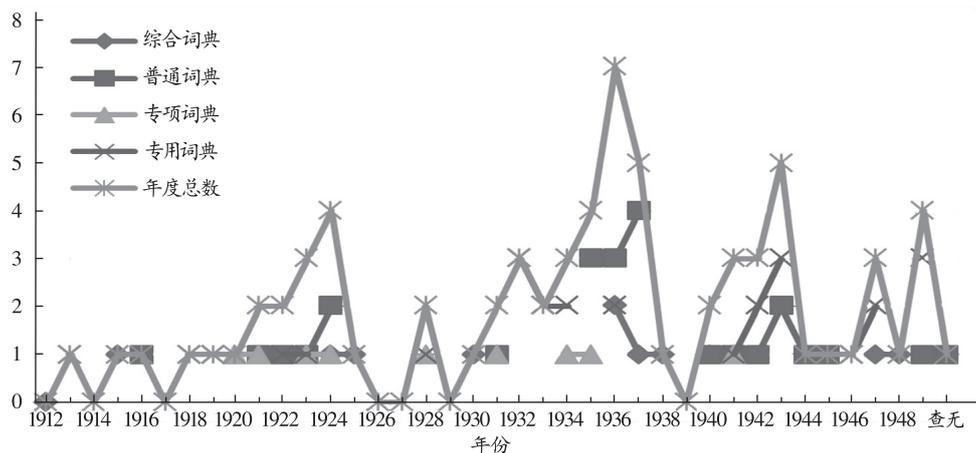


图1 民国时期现代汉语词典出版状况

收稿日期:2024-12-06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2023年度省部级一般项目(中青班项目)“西柏坡时期的语言规划与成效研究”(YB145-109);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开放课题“基于《国语辞典》的两岸词汇发展变化研究”(CSZX-YB-202404)

作者简介:刘善涛(1985—),男,山东枣庄人,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梓赫(1996—),女,山东日照人,文学硕士,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

一、民国时期现代汉语词典年度出版概况

在古代传统小学学术环境下,我国辞书编纂以解经读经和填词作赋为主要目的。注音以字注音、释义征引考源、例证罗列书证、部首或义类编排,竖排加注,专注经典辞句,脱离语言实际,不尚口俗等特点难以适应新旧文化转型期的语言实际、国民教育和社会需求。在现代语文运动的推动下,现代汉语的词典编纂工作也开始寻求变革,“以求适于社会之用”^[4]、“适用于民国”^[5]。

(一) 现代汉语词典的转型初创阶段(1912—1920)

自传教士入华和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学人新型辞书编纂,尤其是汉外双语辞书和专科、百科辞书的编纂一直在持续推进,欧美和日本代表性辞书的成功经验也影响着进步国人对我国传统辞书的反思和对新型辞书编纂的探索。汪荣宝、叶澜的《新尔雅》(1903年)、章太炎的《新方言》(1907年)均为留日期间所作^[6]缘起,《新字典》(1912年)^[6]缘起、《辞源》(1915年)的诸多编者也大都有旅日访欧的经历。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高凤谦曾述其兄高而谦“为余言欧洲训蒙之书乃依学生之年龄特别编辑,材料如何完具,程度如何适合,其所谓字书者则合单字成语而成,种类如何繁多,检查如何便利,余闻而私慕之”^[6]缘起。陆尔奎亦言其“友人有久居欧美、周知四国者,尝与言教育事,因纷论及于辞书,谓一国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比例……充补知识者莫急于此”(《辞源》说略),欧美和日本现代辞书的编纂活动推动了进步国人对汉语语文辞书现代化思考,体现出新型汉语辞书编纂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民国政府的成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激发了进步人士改良国运、参与变革、启蒙大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新型教科书和工具书不断涌现,新型词典也在新思想新理念的指导下得以创制。这一期间共出版词典6部,始创维艰,数量不多,但影响深广,如《南通方言疏证》(1913年)为民国时期第一部方言词典,显示出民初学人对地域方言俗语的重视;《辞源》(1915年)为古今文化转型期汉语词典编纂的杰出代表,始创汉语词典基本体例,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经验;《国文成语辞典》(1916年)为现代汉语普通语文词典的首次尝试,体现了明确的读者意识;《新名

词训纂》(1918年)首次对近代日源新词进行分类整理,对汉日同形词作对比汇编,为新词语专用词典的编纂提供借鉴;《作文类典》(1920年)将2万余条新旧词语按现代义类体例编排成册,逐步向现代语义专项词典发展。

截至1920年,虽因时代及学术条件的限制,汉语词典编纂在检索、注音和释义、举例等方面仍未完全脱离传统辞书的窠臼,但作为文化产品的辞书,其创新过程本就充满了吐故纳新的不断尝试。这一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基本体例和类型已大致廓定,大型综合性词典、中型普通语文词典、专门词典中的方言词典、新词语词典和义类词典等不同词典类型都已陆续出版,为后期词典编纂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现代汉语词典的缓慢发展阶段(1921—1937)

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逐渐进入到全盛时期,现代文学思想、语文政策、语言观念和教育实践上的一系列改革,尤其是语文现代化运动中所发生的语言共同化、文体口语化、文字简便化和注音字母化变革^[7]²,都推动着辞书编纂理念和实践的发展。对基本教学词汇的调查,民族共同语词汇的整理,文学创作和语言表达的口语化,汉字注音的符号化,汉字简化、横向排版与新式标点的推广,以及汉语语法和词义研究的深入都对本阶段的词典编纂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一期间共出版词典41部,在数量上有所突破,类型也更加丰富,体例也更为成熟,代表性词典如:《注音新辞林》(1921年)以民国教育部公布的老国音方案为标准,是最早采用注音字母为词典条目系统注音的现代语文词典。《(平音国音对照)国语辞典》(1922年)专收北京话中的常用词语。国音京音对照注音,口语释义,推动了新国音标准的制定和辞书收词释义的口语化。《国语普通词典》(1923年)是我国第一部全书采用横排编写和新式标点,国音注音、白话释义、体例完善的普通语文词典。《虚助词典》(1923年)是民国时期对双音节虚词加以释义举例的首部虚词语法词典。《王云五大辞典》(1930年)是按新创检字法编排,为部分字词标注词性的综合性中型词典。《字辨》(1933年)将单字和词语辨析分类编排,从形音义方面用不同角度对“习惯读讹写别者,示以各个读音与写法”“为普通一般人之辅导”^[8]编辑大意。《学生小辞汇》(1937年)所收字词

“以教育部颁布之《国音常用字汇》及《标准语大词典》为蓝本”^[9]邹懋序,单字标明词性,并按词性分布布项,是较早按条目语法性质编排义项的词典。《标准语大辞典》(1935年)是国语运动推广中汉语规范词典的早期代表性成果,而《国语辞典》(1937—1945)则代表了国语运动在词汇整理、词典编纂方面的最高成就。《辞海》(1936年)是继《辞源》之后又一部代表性大型综合词典,《中山大辞典》则是计划“仿《牛津大字典》之例”“十倍于《辞源》”^[10]的巨型综合词典,惜因战乱,只在1938年出版了《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而已。

这一阶段的词典出版借鉴了前一时期的编纂经验和新时期的语文建设工作继续开拓创新,后出专精。在大型辞书出版方面,中华书局克服重重困难力推《辞海》,商务印书馆在总经理王云五的带领下着手编纂规模更为宏富的《中山大辞典》。普通语文词典的编纂比前一阶段更为成熟,在国语教育的推进下,国语类学生词典成为各出版机构竞相为之的主要类型,同时也成为新式辞书编纂理念和方法的试验场,从选词、注音到编排检索均有所创新,标准语规范词典受到重视。同时专门词典的类型和数量也得到不断丰富,虚词词典和字词辨析词典也得以出版,进一步推动了汉语词典编纂工作的发展。

(三) 现代汉语词典的曲折前行阶段(1938—1949)

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前一阶段词典编纂的良好发展态势遭到严重破坏,出版机构被毁被迁,纸张生产已无法满足印刷需求,辞书的编纂规模和影响范围也受到严重制约。在大型词典出版方面,在初版《辞源》的基础上,商务印书馆继1931年出版《辞源续编》之后,“专收新名”“融贯新旧”^[11]说例,1939年又出版《辞源正续编合订本》,“依次合并,并放大版本,订成一册”“为阅者检查便利”^[12]说明,反映出大型词典在编修增改中的最新成就。但即便如此,超大型《中山大辞典》也因“八一三沪战突发,纸版铅字尽毁”“经费支绌”“人事倥偬,不遑宁处”(编纂《中山大辞典》之经过)等缘故,致使“编纂处中途停办”,“《“一”字长编》移港重排”^[10],其他小型出版社的境遇更是步履维艰。

这一阶段共出版词典26部,不同类型的词典均有出版,出版机构也更为多元,中华书局《中华国语大辞典》(1940年)是一部“收集标准地日常

习用的辞语四万余条”^[13]编辑大意的普通语文词典;世界书局《词典精华》(1947年)是一部收录各类词语2.5万余条的综合词典。此外,奔流书店《学生(求解、作文、成语、辨字)四用辞汇》(1942年)、亚东图书馆《学生白话大辞林》(1943年)、中央书店《大众小辞林》(1945年)、新中国书局《(写话求解)两用字典》(1949年)均为普通语文词典;启明书局《启明辞林》(1940年)、青光书局《辞渊》(1948年)为综合词典;重庆旅行指南社《重庆方言》(1942年)、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新词典》(1943年)则是方言词典、新词语词典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本阶段的部分出版机构、词典编者在政治思想方面开始逐渐倾向以共产党为首的民主进步力量,因而在词典编纂宗旨方面,他们的服务对象也自然以工农大众和解放区群众为主。如桂林文化供应社是在周恩来的建议下,胡愈之联合老同盟会员李任仁于1939年创办的一个文化出版机构;裕民印刷厂的前身为1941年创办的晋冀鲁豫边区印刷厂;河间冀中新华书店源于1937年在延安成立的新华书店;吉林新中国书局即东北光华书店、大众辞书编译社等都是以共产党为主力领导的出版机构。

早在1933年生活书店出版顾雄藻《字辨》时,就明确提出“为小学教师、中学生及曾经中小学校毕业之农工商各界”^[8]编辑大意而编;上海中央书店1945年出版的姚乃麟《大众小辞林》的出版宗旨就是为了“完全适合于一般民众和中小学生学习单字和词义之用”^[14]凡例。及至本阶段出版的新词语词典更体现了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目的,共产党员王穆夫主编《国民辞典》(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胡济涛和陶萍天主编《新名词辞典》(春明书店1949年)、《新辞典》(裕民印刷厂1946年)的编者筱铮和(皇甫)束玉等也是共产党员。此外还有培之和刘坚《新编小辞典》(河间冀中新华书店1947年)、大众辞书编译社《新名词学习辞典》(大众辞书编译社1949年)、周如暉等《新名词学习辞典》(上海星潮出版社1949年),等等。词典收词“以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一般习见的名词为限”,“再还有解放区已流行的名辞”^[15]序,“凡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宣传的名词概所不采”^[16]凡例,释义方面“根据进步的立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为观点”^[16]凡例,“求得各种词类的解释,通俗易懂,特别要求解释得正确,使得对于树

立革命观点、阶级观点要有帮助”^{[15]序}，“有异于一般在解放前出版或编辑的党派性立场模糊的同类型质的辞典”^{[16]凡例}，这些词典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无产阶级进步思想的传播，也为新中国的辞书事业培养了人才。

二、不同类型词典的编纂状况与特点

(一) 综合语文词典编纂情况

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新学词汇不断出现，以“词”作为主要收录对象且新旧词汇、语文百科兼收的综合性语文辞书编纂与出版受到特别重视。民国时期共出版综合性语文词典 11 部，占现代汉语词典总数的 15.07%。在我国现代辞书发展史上，首先打破传统字书和雅书体例“空前的第一部”^[17]辞书为商务印书馆 1915 年版陆尔奎主编的《辞源》。该书集多种创新性要素于一身，依部编排、字词兼收、以字率词、专注释义、区分义项、列举书证、前言附录一应俱全，其“首创的系统的体例，是中国独有的辞书体例，《辞源》以后的汉语辞书所用的基本编纂原则，尽在其中了”^[17]，奠定了我国现代汉语词典编排的基本体例，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了典型蓝本。1936 年出版的《辞海》是继《辞源》之后出版的第二部大型综合词典，该书由舒新城等主编，中华书局出版，延续《辞源》编纂体例，收列单字 13955 个，语词 21724 条，百科词目 50124 条，总计 85803 条，700 多万字^{[18]87}。《中山大辞典》旨在“仿《牛津大字典》之例，不仅解释意义，并表明各字各辞之历史”，计划“收单字约六万，辞语约六十万”“十倍于《辞源》”^[10]，但因战时原因，只出版了《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1938），收“一”及“一”字打头词语 5565 条，体例宏富，至今难有超越。

在《辞源》《辞海》等大型辞书的影响下，还出版了一系列中型综合词典，如商务印书馆 1924 年出版的《（国音白话注）学生词典》，选词立足教材，释义偏重白话，专供“国民学校（三年以上）和高等小学校的儿童在自力读书的时候检查用的”^{[19]编辑大意}。中华书局 1925 年出版的《新式学生辞林》收“应用方面及科学方面之普通名词”^{[20]编辑大意} 3 万余条，白话释义，区分义项，配有少量例证。商务印书馆 1930 年出版的《王云五大辞典》按“四角号码检字法”编排，收字 1 万左右，词语 5 万多条，白话释义，部分条目标注词性，以“供高中以下高小以上程度一般人的参考”^{[21]序}。

世界书局 1936 年出版的《（大众实用）辞林》按“八部检字法”编排，纵向两栏，横排编写，白话释义，多义字词按引申顺序排列，次年在其基础上缩编出版了《中学生辞林》，单字按义项标明词性，字头下先列“齐脚字”，即逆序词，再根据正序词的音节数和笔画数为词语立目释义，外来词“一律附注原文”，文末单列英文缩略词表并释义。世界书局 1947 年出版的《词典精华》不收单字，部分虚词义项注明词性，外来词附注英文原词，白话释义，多义词分列义项，例证有书例和自编例，例证中被释词用“~”代替，在所需参见词语前标记※。青光书局 1948 年出版的《辞渊》本着“新旧兼收，趋于实用”^{[22]序}的原则，在《国音常用字汇》的基础上加入新字、俗字和简体字，并将百科性词语用略语标出 20 个小类，单字标明词性，词性后分列义项，多音字、同形字分别注明，字词白话释义，语言简洁，附有例证。

(二) 普通语文词典编纂情况

普通语文词典的出版与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和教育普及密不可分。民国时期共计出版普通语文词典 26 部，占全部词典总数的 35.62%。词典选词大多依据教育部颁布的各种基本字汇表，紧扣教材和教辅用字用词状况，使用对象主要面向普通学习者和教师，在注音、检索、释义等方面多有创新，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学要求。如 1916 年庄适在中国出版公司出版了《国文成语辞典》^①，该书“仿欧西成语辞典 *A Dictionary of Phrases* 之例，不列单字”^{[23]凡例}，所收词语“限于中国文学”中的文言和白话词语，依《康熙字典》例分部，词语“注释计分两项，甲说明定义，乙注明出处，以简明为主”^{[23]凡例}，可见早期词典所具有的借鉴西方、融合传统、锐意创新上的杂糅特点。

1918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行了老国音注音字母，1919 年 4 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请教育部改“国文”为“国语”，并要求“课本中所载文字内容是否与国音字典、国语辞典、国语文法相合，应由本会组织一个委员会随时审查”^{[24]440}；9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部官方注音字典《国音字典》。1921 年中华书局《注音新辞林》将“普通文以及书函中所应用之辞料”“以普通应用为标

^①因民国时期现代意义上的“词”概念尚未确立，“成语”一词既可指二字词，也可指表意较为凝固的三字四字的惯用语、成语，辞书性质应结合具体收录单位而定，高小方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科学》中将其归入“成语典故类”资料，当误。

准”^[25]编辑大意悉数收录,“无论单字双字,每字下均加以注音字母”,“专供学校及社会普通作文之用”。《注音新辞林》虽力避“偏僻及艰涩”,以求“适于应用”,但在收词和释义的白话性和口语性上不及1922年出版的《(平音国音对照)国语辞典》。后者由周铭三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收单字,专收“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北平人所常用的辞句”^[26]编辑大意5500条,“按笔画多寡”排列,摆脱了《康熙字典》部首顺序,初版注音为注音字母标注的北京音,1930年第三版“添注国音以为对照”,注音后“先有解说后有举例”,体例完善,特色鲜明,体现出编者对北平读音和词汇的重视。

“词典”作为一种新的辞书类型,在时代背景下积极容纳各种创新要素,推进词典体例的现代演变。中华书局1923年出版的《国语普通词典》不仅率先采用横排编写和新式标点,书前例言还使用分词连写,字词条目均以国音字母注音,“解释和举例,力求浅显”^[27]例言,书后配有附录和图书推销广告。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的《(标准国音)白话词典》不收单字,除国语词汇外,“兼收语体文和白话小说中习用的各地方言成语”^[28]例言,“附注国音,用语体解释”,用注音字母在词条右侧注音,白话释义,多义词用“●”分隔,配有自编例句。1931年出版的《王云五小辞典》在《王云五大辞典》的基础上缩编而成,同时还创新性地编入“接头语”和“同训异义字”,即在字头下罗列逆序词和近义词,“以供小学生的参考”“使应用本书的人得收触类旁通的效用”^[29]自序。1935年出版的《标准语大辞典》是“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国语建设工作之一”“专供研习、检查标准语的应用”,也是我国第一部官方规范词典,该书“所采的词、语以标准地(北平)的通行语为范围”,所收单字“以合于口头应用的单音词和本书词、语里所应用的为限”,词语列于单字下,“只要是口头上应用的,不论新旧,一律兼收并蓄”,释义“以现在标准地通用的为准,古义和方言的意义,概不采取”^[30]编辑凡例,字词例证用“(例)”标明,多为词例和自编例,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意识。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汉语普通语文词典应属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语辞典》(1937—1945),该书为民国时期对国语(即“民族共同语”)词汇加以系统整理与描写的中型语文词典,也是我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音序词典,这部词典的出版既是对前期现代性词

典编纂理念的系统总结,也为后期普通语文词典的编纂提供了典型蓝本,在现代汉语语文辞书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开启了现代汉语描写性语文辞书编纂的先河”^[31],是“中国语文乃至文化迅速走向现代化的最显著标志”^[32]³³²,并为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提供了诸多借鉴^[33]。

(三) 专用语文词典编纂情况

专用语文词典的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不同类型词语的创制、引进有关,更与词典编者对方言词、新词语、外来词和词语使用中各类词语辨析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共出版该类词典27部,占词典总数的36.99%,其下又可分为不同子类。

1907年章太炎在日本秀光社出版的《新方言》词典为民国时期方言词典的编纂提供了重要参考。数据库中专门收录这一时期不同地域方言词语的词典11部,在大陆学者主编的10部方言词典中均为义类编排,注重古方互证,考证语源,贯通今语,如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1913年)收词1670条,按义类分为4卷50类,文言释义,多为书例。张慎仪《蜀方言》(1919年)收词824条,“每条备注来历,明非臆造”^[34]凡例。叶俊生《闽方言考》(1923年)以“[]”符号标明方言字词,附有书证。罗翊云《客方言》(1932年)收录客籍广州人方言词语约1千条。孙仲南《广东俗语考》(1933年)收录粤地俗语词1460个。唐幼峰《重庆方言》(1942年)收录重庆方言词480条。翁辉东《潮汕方言》(1943年)收录潮汕方言词1千余条。范紫东《关西方言钩沉》(1947年)收录关西方言约500条。另有台湾日据时期出版的日粤对照词典《广东语辞典》(1932年)收录粤方言词语2.5万余条,每词先列日文、再列中文,按日语五十音图顺序排列。

与《新方言》的编纂背景相似,汪荣宝、叶澜在留日期间合作编纂了《新尔雅》并于1903年由上海明权社出版,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百科学术辞典性质的书籍”^[35]³⁴¹。该书虽不合现代辞书编纂体例,但收录了大量新词新语,对新词语词典的编纂产生了积极影响。民国时期共出版新词语词典11部,编排方式由义序向形序演变,释义语言也由文言向白话迁转,在传承中根据时代特点和词语性质逐渐向现代词典过渡。如周起予《新名词训纂》(1918年)收双音节日源新

词 606 条,分政、学、语、物 4 类,作者据“新义之原出载籍者,条分缕析,灿朗耐观,间列按语,尤确凿知”^[36]唐咏裳序。洪超《新名词辞典》(1932 年)收录哲学、社会科学等新名词 3100 余条,部分词条附有英文对应词,多义词分别义项,白话释义,关联词语之间设有参见,正文后有附录“简名”,收字母词 ABC、CP、X 光线等 10 个。此后,邢墨卿《新名词辞典》(1934 年)收词 1300 余。胡行之《外来语词典》(1936 年)收古今外来词 3000 余。王穆夫《国民辞典》(1941 年)“收集常用的新名辞新术语约 1000 个”^[37]用法说明。筱铮《新辞典》(1946 年)收词 300 余条,均依首字笔画数为序,兼收字母词,白话释义。王云五《王云五新词典》(1943 年)依据“《佩文韵府》摘取看似新名词之同语,述其来源,并附以今古不尽同之释义”^[38]自序,收新词语 3700 多条,白话释义,分释旧义和新义,原有义配有书证,新义偶有书证。抗战胜利后的新词语词典以满足解放区民众对新词语新观念的认知为主要目的,如《新编小辞典》(1947 年)专收政治、经济、文学等方面的新词语约 800 条,“供解放区干部、教师使用”^[39]编者的话;《新名词学习辞典》(周如暉 1949 年)收政治、经济、国际等方面的新名词 800 条左右,“对于现代一般人均须懂得的世界动向和国际知识及国内的新知识、新思潮、新学说的搜罗最为丰富”^[40]编辑凡例;《新名词辞典》(1949 年)收词 3 千余,分国际、政治、经济等 10 部 44 小类,外来词语注明英语对应词,横向排列,白话释义,解释详备,后附《中国土地法大纲》等文件。

在国语推行和文字改革的大背景下,字词辨析类工具书的编纂成为辅助教育的重要参考书,在 20 世纪 30 年代教育改革和文字实验的推进期出版了 12 部汉字辨析字典和 4 部字词辨析词典,前者以单字为处理对象,后者字词兼收,如顾雄藻《字辨》(1933 年)分义辨类、音辨类、体辨类、词辨类 4 大类 23 子类,对于“字之使用及读音、写法偶涉模糊,随时检查确定”^[8]编辑大意,音辨类中的专名词读音、异字同读、重文异读和词辨类均为词语辨析,反切注音、文言释义、附有例证;1935 年杨燮祁增补出版《字辨补遗》。谢苇丰《文字指正》(1934 年)分字义指正、字形指正、字音指正、成文词指正 4 大类 12 小类,类中伴有词语辨析,白话释义,多义字词分项标示,例证为自编例和词例。新辞书编译社《实用辨字辞典》(1936 年)收字词

5000 条左右,分辨音、辨义、辨体、辨词 4 部 16 小类,“材料丰富,为任何同类书所不及,解释精详,且全用白话,尤为本书特色”^[40]编辑例言,配有少量例证。刘治平《字辨》(1943 年)分字义、字音、字体、成文词辨正 4 大类 17 小类,单字直音注音,词语不注音,文言释义,部分字词标明书证。此外,民国时期另有 1 部专门收录由两个相同的字组成的词语词典《迭语》(王峻,1922 年),共收叠词 3081 个,按部首编排,有注音和注释。

(四) 专项语文词典编纂情况

及至近代,随着欧美百科全书(encyclopedia)的出版,“日本的百科全书便由传统的类书形式转入现代百科全书形式”^[41],如日本文部省编译局主编的《百科全书教导说》(1873—1880 年),学者田口卯吉编译的《泰西政事类典》(1882—1884 年)等。“百科全书”“类典”等术语传至中国,推动了中国现代汉语义类词典的发展,本数据库中该类词典共 4 部,杨喆的《作文类典》(1920 年)便是古今转型中传统词语类类书与欧日新式百科词典结合的过渡期产物。该书收词 2.3 万余条,按现代义类观念分“国家、法律、政治、职官”等 31 大类,近 300 个小类,所收词语以“沟通新旧”^[42]说明为目的,“上下古今,一炉熔冶”,“于新旧各学,提纲扼要,竟委穷源,不啻摄数十巨编之小影”,这部词典的编纂原则已逐步向现代语义词典趋近。义类词典的古今转型还体现在收条立目方面,前书只收词语,曹春涵《分类字源》(1921 年)则收字 1 万左右,“分部四十,分类百有十六,而每类之中,有细分各属,多者至十余属不等”^[43]说略,与传统字书看似无异,但在“解字之后,罗陈典制,盖欲合字典与辞典为一书”。上海大陆图书公司 1924 年出版的王士湜《实用成语大辞典》“搜集文艺上习用成语熔冶古今,各以类从,分为四十八门”^[44]例言,收录双音节和多音节词语 6500 条,文言释义,语言简洁,书前有义类总目,书后有笔画索引,便于检索,1937 年改为《(求解作文两用)国文成语大辞典》并由上海教育书店出版发行。至张萼荪《分类学生辞源》(1931 年)的出版,现代汉语义类词典的基本编纂体例大致成熟和稳定下来,该书将各种普通名词分为 10 部 66 类,每类首列单字,次列二字以上词语,单字采用反切、直音和罗马字母注音,词语无注音,释义偏文言,不同义项用“○”隔开,列举书证,详释词语用法,书前有首字笔画检字表,分单

字之部和双字之部(三字四字),书后为版权页,体例完整。

民国时期的语法类词典以虚词词典为主,共5部,数量不多,但也在时间顺序上呈现出了古今转型的特点,如施括乾《虚助词典》(1923年)据《经传释词》《助字辨略》等书收虚助字词约400个,附录“词之释要”收双音虚词30个,文言释义、分列义项、配有书证;薛传薪《作文虚字用法》(1928年)收虚词136个,包含双音节和三音节虚词,“可备高等小学学生参考之用”,词条标明词性,“必先详其用法(间用白话口气解之),然后示范文言”^{[45]凡例},义例兼备。顾佛影《虚词典》(1934年)分文言、白话两部,文言之部收词400余条,每词分普通用法和特殊用法两种,“普通用法即所谓浅易之方式,为现社会所习用者”,“特别用法则惟见于古籍,所以供嗜古者之检讨也”,白话之部收词100余条,“皆属现代语法,故不复有普通特别之分”^{[46]凡例}。沈镛《虚字指南》(1935年)收“独用单字104,二字以上合用字57”^{[47]凡例},依据词性和用法分条释义,释义后说明被释词的使用位置,例句则文白对照,全面展现该词用法;吴天敏《北平助量词》(1941年)收集北平人常用助量词257个,笔画排列,白话释义。

三、民国时期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总体特征

(一)“词典”是古今汉语词汇转型中的集中反映

自两次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甲午战败后,汉语词汇出现急剧调整的态势,“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多得多”,“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了以前几千年”^{[48]598}。现代汉语语义词典的兴起缘于汉语词汇发展中双音化占据主流,以及现代“词”观念对传统“字”观念的更易。它肩负了吸纳、整理古今词汇,创制、推广现代新词,推动、促进现代汉语发展的重要使命。《辞源》有感于新词激增导致的“新旧扞格,文化弗进”(《辞源》说略)局面,“以补助知识为职志”,对“社会所需”的新旧普通名词加以整理,详述其源流变化,“以求适于社会之用”。《辞源续编》则进一步“广收新名”“融贯新旧”^{[11]说例},扩大收词范围,呈现词汇古今演变的历史脉络,后出《辞海》,甚至未完成的《中山大辞典》《中国大辞典》均欲对古今汉语词汇进行系统整理。不独大型辞书如此,中

小型辞书也从不同角度系统勾勒出了古今汉语的词汇面貌,如普通词典集中收录了某学段教材中“关于应用方面及科学方面之普通名词”^{[20]编辑大意}、白话词语和国语词汇;方言词典侧重收录某地区流行的方言词、俗语词;新词语词典则专门整理汇集不同类型的新词语;义类词典、虚词词典亦按照现代语义、语法体系对旧词语进行分类归纳,这都显示出古今汉语词汇转型对“词典”编纂的影响。

(二)“词典”推动了现代文化建设和语言建设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辞书的文化功效,清代在传统字书、类书、雅书的编纂与研究方面铸就了封建时代的高峰。及至民国,社会骤变,传统辞书类型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在语言变革中产生的新型辞书——“词典”,在汇集现代新词汇、诠释新语义、散播新思想等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文化建设和语言建设。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艰辛探索,新的话语思想体系在新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被得以关注,新型“词典”则是构建新话语体系的重要媒介,由是“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4]，“一国文化愈进,其字画辞书愈益繁多”^[49]，“辞书之应用,较教科书为尤普”^{[6]缘起}的呼声在民初便受到重视,及至《中国大辞典》则欲“给四千年语言文字和他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帐”^{[50]黎锦熙序}。综合词典、学生词典、白话词典、国语词典、辨析词典等新型词典的编纂与出版有效地推动了这一时期国民教育的普及、新文化建设和汉语的古今转型,也为早期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和稳定、国家标准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词典”与社会、读者的关系得以重视

传统辞书“只是供文人的‘獭祭’”^{[51]黎锦熙序},囿于解经读经和烦琐考据,“供作者之用,非以供读者之用”^[4],与社会和民众严重脱离,“不特科学界新出之字概未收入,即市井通用者亦间或不具,其释义则直录古代字书,而不必适周乎世用”^[5],自然也就无法适应晚清以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型词典的编纂是文化转型期出现的产物,较好地适应了社会变革和读者需求。新文化的传播为新型辞书编纂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蔡元培曾评价《新字典》“于民国成立之始,得此适用之《新字典》,其于国民之语言及思想,不

无革新之影响”^[5], 而由字率词, 在其基础上编纂的《辞源》则首创“词典”体例, “以求适于社会之用”^[4], 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而《辞源》的成功既反证了新型词典的社会价值, 也激发了出版机构对词典市场的关注。自此, 词典出版与社会变化和读者需求紧密联系起来, 如中华民国教育部门对注音字母的颁布促进了“国音”类词典的丰富; 白话文运动促进了词典收词释义的俗白化和口语化; 国语教育和国语运动促进了标准语词典的编纂; 学生用词、造句、作文的困难使字词辨析词典、虚词词典和语义类词典得以发展; 方言词典和新词语词典则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区域词语和新词新义的使用需求。

(四)“词典”的功能、体例和类型不断得到丰富

“我国从前只有字典, 欲检查两字以上之辞, 殊不易觅”^[25]编辑大意, 传统辞书作为小学研究的附庸缺少独立价值, 现代“词典”自产生之初就将其职能定位为“供人查检”, “字典诸书, 无非备人检查所疑之字耳”^[43]说略, “凡为检查者所欲知, 皆辞书所当详也”^[4]。词典的功能定位既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求, 又促进了词典体例和词典类型的发展。蔡巧因曾指出词典编纂的五要素: “检字要便捷”“材料要适用”“搜罗语汇要普遍”“解释要清楚”“音读要正确”^[52]序, 分别对应词典的检索、收词、释义和注音等结构要素, 较为全面地总结了现代词典的体例特征。民国时期不同检字法的创立与应用^[53], 词典注音对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的采用, 选词注重以教材为依据, 释义由浅近文言向白话口语的全面过渡, 举例兼有词例、书例和自编例, 部分词典标注词性、穿插图表、后附附录等做法都促进了现代词典编纂体例的丰富和发展。同时, 因词典编纂中对不同结构要素的侧重不同也催生出不同的词典类型, 如收词释义侧重语文性词语的则为普通语文词典; 若专以某学段学生为读者对象, 收词以其教材为来源, 则为学生词典; 若结合教学材料, 偏重辨析字词的形音义, 则为辨析词典; 若侧重辨析词性, 则为语法词典, 民国时期主要代表性词典为虚词词典; 若为学生写作作文, 注重词语的同义类聚和词义辨析, 则为义类词典等。

另外, 民国词典编纂活动在逐渐丰富和发展的同时, 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性。中小型词典由于编纂难度小、编纂周期短、出版成本低、读者范围广, 因而编纂者对这类词典的编纂热情和出

版数量相对较高, 而大型词典因经费不足、政局动荡、人员流动等方面的影响, 出版数量相对较少, 像《中国大辞典》《中山大辞典》等宏伟的编纂计划则限于各种原因不得不中断夭折。不仅如此, 各编纂出版机构的发行量也有明显差异, 民国时期的出版机构属地以上海、北京、广州和重庆等地居多, 不仅出版地区不平衡, 各出版机构的发展状况也不均衡, 民国词典中出版数量最高的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 也以它们的词典出版最具影响力。总之, 民国现代汉语词典已经开始了从传统辞书向现代辞书一步步转型的历程, 在“推陈出新”中奠定了我国现代新式词典的基本类型和形式, 促进了我国辞书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李明, 庞洋. 关于辞书现代化的思考考[J]. 语文研究, 2006(3).
- [2] 张志毅. 辞书强国——辞书人任重道远的追求[J]. 辞书研究, 2012(1).
- [3] 章宜华, 雍和明. 当代词典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4] 陆尔奎. 《辞源》说略[J]. 东方杂志, 1915(4).
- [5] 蔡元培. 商务印书馆《新字典》序[J]. 东方杂志, 1912(4).
- [6] 陆尔奎. 新字典[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12.
- [7] 周有光. 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
- [8] 顾雄藻. 字辨[M]. 上海: 生活书店, 1933.
- [9] 储祎. 学生小辞汇[M]. 上海: 东方书店, 1937.
- [10] 王云五. 编纂《中山大辞典》之经过[J]. 东方杂志, 1939(1).
- [11] 方毅, 傅运森. 辞源续编[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1.
- [12] 商务印书馆. 辞源正续综合订本[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9.
- [13] 陆衣言. 中华国语大辞典[M]. 上海: 中华书局, 1940.
- [14] 姚乃麟. 大众小辞林[M]. 上海: 中央书店, 1945.
- [15] 筱铮, (皇甫) 束玉. 新辞典[M]. 邯郸: 裕民印刷厂, 1946.
- [16] 周如暉. 新名词学习辞典[M]. 上海: 大众辞书编译社, 1949.
- [17] 王宁. 百年《辞源》的现代意义[N]. 光明日报, 2015-12-22(11).
- [18] 李开. 现代词典学教程[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 [19] 李康复, 唐昌言, 等. 学生词典(国音白话注)[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4.

- [20] 中华书局.新式学生辞林[M].上海:中华书局,1925.
- [21] 王云五.王云五大辞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 [22] 周华岩,吴研因.辞渊[M].上海:青光书局,1948.
- [23] 庄适.国文成语辞典[M].上海:中国出版公司,1916.
- [24]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 [25] 中华书局.注音新辞林[M].上海:中华书局,1921.
- [26] 周铭三.(平音国音对照)国语辞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 [27] 马俊如,后觉.国语普通词典[M].上海:中华书局,1923.
- [28] 李康复,唐昌言,等.(标准国音)白话词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 [29] 王云五.王云五小辞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 [30] 国语教育促进会审调委员会.标准语大辞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 [31] 王宁.论辞书的原创性及其认定原则[J].辞书研究,2008(1).
- [32] 张志毅,张庆云.理论词典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33] 晁继周.从《国语辞典》到《现代汉语词典》[C]//中国辞书理论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
- [34] 张慎仪.蜀方言[M].自刊,1919.
- [35] 窦秀艳.中国雅学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4.
- [36] 周起予.新名词训纂[M].上海:扫叶山房,1918.
- [37] 王穆夫.国民辞典[M].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
- [38] 王云五.王云五新词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
- [39] 培之,刘坚.新编小辞典[M].河间:冀中新华书店,1947.
- [40] 新辞书编译社.实用辨字辞典[M].上海:童年书店,1936.
- [41] 潘钧.日本百科全书的发展及其源流[C]//日本学(第13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 [42] 杨喆.作文类典[M].上海:中华书局,1920.
- [43] 曹春涵.分类字源[M].上海:翼文书局,1921.
- [44] 王士澍.实用成语大辞典[M].上海:大陆图书公司,1924.
- [45] 薛传薪.作文虚字用法[M].上海:大东书局,1928.
- [46] 顾佛影.虚词典[M].上海:大公书店,1934.
- [47] 沈镛.虚字指南[M].上海:东方书店,1935.
- [48]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49] 熊希龄.《中华大字典》序三[J].大中华,1915(4).
- [50]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语辞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51] 陆费逵,舒新城,等.辞海[M].上海:中华书局,1936.
- [52] 蔡巧因,等.启明辞林[M].上海:启明书局,1940.
- [53] 平保兴.民国时期汉字检字法史论[J].辞书研究,2014(5).

Survey of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U Shangtao¹, WANG Zihe²

1. School of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2. Basic Teaching Department, Shandong Water Conservancy Vocational College, Rizhao 276826, 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inception one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ictionary compilation and lexicography construction in New China. In this period, the three stages of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ar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itiation stage, slow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tortuous advancement stage. The four major types of published dictionaries are the comprehensive language dictionaries, general language dictionaries, specialized language dictionaries, and specific-purpose language dictionaries. The emergence of “dictionary” concept and the compil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e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which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ulture and language, facilitates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 with the society and readers, and contributes to the maturation of dictionary functions, styles and types.

Key words: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dictionary; stage feature; type feature; general feature

(责任编辑 雪 箫)